

【哲学探讨】

从中国美学史看中国艺术悲剧精神的缺位*

王 员 林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悲剧诗人总是强烈地渴望和寻找着灵魂的归宿和精神家园,当他在西方遇到了宗教的欢迎时,到中国一定会受到伦理观念的热情款待。当他在这种欢迎和款待的温馨气氛中陶醉时,他就变换了自己的角色而不再是悲剧诗人了。自儒家的伦理观念在中国美学史和思想史上开始显现威严时,中国艺术也就开始书写自己“温柔敦厚”的历史了。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美学史的主导思想这一事实出发,分别以诗、戏剧、小说以及其它表现型艺术(音乐、舞蹈、绘画)为例论证中国传统思想(儒主道辅)导致中国艺术的悲剧精神的缺位。

关键词: 中国美学史;中国艺术;悲剧精神

中图分类号: B2;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924(2005)07-0076-03

On the Lack of Tragic Spirit in Chinese Arts in View of Chinese Aesthetic History

WANG Yuan-lin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ragic poets always long for a soul and spirit home. When welcomed by the religion in the west, they are sure to be treated cordially by ethical conception in China. And when they are elated in the gentle and fragrant atmosphere, their role of tragic poets changes and they are no longer tragic poets. Since the ethical concept of Confucian school became majestic in Chinese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Chinese arts began a new leaf of "soft and pacific". Taking poetry, play, novel and other art presentations (such as music, dancing and painting) as examples, and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onfucianism's ideology is the main ideology in Chinese arts, this paper expounds a truth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y (Confucianism playing chiefly and Taoism playing subsidiary) led to the lack of tragic spirit in Chinese arts.

Key words: Chinese aesthetic history; Chinese arts; tragic spirit

朱光潜先生说:“怀疑论者是精神上的流浪者,他们既没有对家园的热情,也没有对家园的崇拜^[1]”。可悲剧诗人却无论在理智还是情感上都强烈地追求着这样的家园。然而,当宗教的狂热崇拜在西方世界蔓延时,悲剧便变得有些老态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说,只有古希腊才有真正的悲剧^[1]。

古老的华夏民族自古就有着宽容大度的精神,他们对苦难生活理解和接受,对生命的不合理性不持疑义。因为,他们坚信今生的苦难源于前生的罪孽,此生的忍让必定换回来生的幸福。一切

都是命中注定,无须对此惊讶好奇。是悲哀的宿命论也好,是怯懦的表现也罢,反正他们的精神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他们不再是流浪的孩子,他们有着虽简陋却朴实真诚的家。家长是尊辈,家教便是仁义道德,是强烈的伦理观念。他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维护家长的尊严和家教的权威。

那么,是什么力量催生了这种思想?是谁为他们建制了一个如此牢固的精神家园呢?是封建社会的礼乐文化与孔子创立的儒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前者在于统治天下的政治目的;后者是控制

* 收稿日期: 2005-03-15

作者简介:王员林(1980-),女,江西九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学研究。

人类精神的伦理观念,两者的结合致使上下几千年的炎黄子孙们沉浸在伦理理想中而甘愿接受哪怕是极端残酷的封建统治,并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历史地积淀在人们心里。当我们回顾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和美学史(包括艺术史)时,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儒学会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代名词了。从中国美学史的整体发展阶段来看,它经历了从儒家对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开始到遭遇各家批判,再到融合同化各家,并最终回到儒家思想的3个循环过程:第一,先秦两汉艺术社会学阶段。从孔子到荀子,这是一个经历了墨法老庄等诸子百家对儒家批评,以致最后各家被荀学整合的阶段;第二是艺术哲学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齐梁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从思想渊源来看这是一部融合了儒、道、周易、玄学以及佛学各家观点的“体大思精”的艺术哲学著作,但其艺术观仍然是儒家的。这一点从刘勰始终以“丽以则”(儒家的正道,守则)为评价文章的一个根本原则可以看出;第三,艺术心理学阶段,从司空图的“诗辩味”和严羽的“妙悟说”到李贽的“童心说”,却最终还是折回到了王夫之对“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思想的极力推崇^[2]。很明显,自汉武帝时董仲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如果说中国还有思想的话,那就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讲求实际的、世俗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可与较为思辨的、形而上的道家思想相融合、相补充,因为它们有着相似的对和谐人生的肯定和追求,对原始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崇拜。这种结合以儒家思想为主,表现在意识形态中产生的整体效果就是:崇尚以“和”为美的中庸精神;直观地把握现实世界,常停留于浅层次的感觉印象;注重层面上的和谐有序,排斥消解不和谐的对象。因此,从这种思想中诞生的中国艺术创造了优美得让人一唱三叹的诗、书、画、音乐、舞蹈,甚至戏剧小说,却找不到像荷马史诗那般长篇叙事诗,和那种撼人心魄的古希腊罗马悲剧。可以说,传统的中国艺术就是缺少这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在传统中国艺术中的缺位几乎在任何艺术形式都得到了深刻体现,甚至悲惨的故事也如此。下面我们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本该是悲剧的作品中(诗、戏剧、小说)来感受这种悲剧精神遗缺带来的遗憾。

当《诗经》中信男善女因爱情而叹息或欢呼的声音回荡在充满瑰丽幻想和奇异民风的楚国大地时,自小好“奇服”,在“怪力乱神”的南国文化中成长的屈原却以超群的智慧和热烈的浪漫激情将自北而南的“文质彬彬”的理性之声刻入心灵,并以此指引自己为“美政”的高远理想和抱负。怀王的信任和重视给予了他信心和勇气,迈步在前进的光辉大道上,他意气风发地高唱华美幻彩的诗歌。然而,当理想碰到现实,命运总会转弯。屈原的命运就是这样。无耻小人靠奸诈谗言迷惑昏庸无能的统治者总是屡试不爽。屈原最终被排挤出了政治的中心。这对一个以此为抱负的执着而伟大的理想追求者来说是痛苦,甚至致命的!所有消耗在此的激情、寄托于此的希望,甚至包括生存的意义都随着狂风的一声呼啸而成为幻影。理想、抱负、热情,一切的一切灰飞湮灭;迷茫、哀怨、痛苦、愤怒,一切的一切充斥心头。然而,所谓“愤怒出诗

人”。愤怒也成全了屈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荣耀。他以旺盛的创造力强烈地抒发着内心无比的愤慨,结晶出中国诗史上闪耀着璀璨光芒的《离骚》。咀嚼着屈原用华丽的辞藻书写的人生之途和胸中之愤时,人们似乎看到诗人伟大而光辉的形象,也切身体会到诗人充斥心中的无限感慨。然而,这优美的抒情诗不像荷马的长篇叙事诗史,也不是震撼人心的古希腊悲剧,却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之经典。它继承了儒家“怨而不怒”的理性精神和道家“天地合一”的思想,拥有着遨游于无穷宇宙的宽大情怀和艺术人生观。后世之诗人在这种思想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成长。再悲苦的时代也力求让悲苦的人民看到希望的曙光,哪怕这光微弱得完全可以忽略。也许这就是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吧!中国的诗史就是中国的思想史。

戏剧也如此。戏剧在古希腊就蓬勃向上,而我国戏剧却等到元朝才开始发育。这能归咎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不发达吗?从龙飞凤舞的原始歌舞中,从青铜饕餮的狞厉美里,从唐诗宋词的光辉下,我们清楚地得到了否定的答案。那么原因何在呢?仍然在于潜伏于戏剧艺术中的道德目的和伦理观念。不具备这些特质,戏剧必将遭受冷遇。长期以来戏剧都被认作是仅供取乐的,直到为蒙古所统治的元朝时期,戏剧才因注入了域外血液而得以成长发展。然而,有着强烈的“根”的意识的中国人还是无法脱离传统思想的怀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总能让人感受到安知乐命的乐天思想。中国戏剧形象中身负憾天动地之冤屈的人物是窦娥。窦娥出身贫贱,从小被卖作童养媳,结婚不久丈夫就弃她而走向了不归之路。她的人生再次陷入悲怆的与婆婆的相依为命中。然而,流氓的恶毒还不肯放过她满目疮痍的精神支架。一个普通弱小的女子就因如此接踵而来的沉痛打击和灾难宣告了身体的毁灭!最终,她悲惨的生命走向了痛苦的终结。然而,有着伟大同情心和道德感的中国观众如何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呢?不,永远接受不了。怎么办?窦娥死也要将自己的冤屈上诉于博大而神通的天地,并立下3桩誓愿:死后血贱白练、六月飞雪、大旱3年。高尚而天真的同情心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一悲苦灵魂的誓死请求。窦娥的3桩誓愿全部应验。并且,3年后其父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重审此案,为窦娥昭雪。只有富于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中国戏剧,才能为一个如此悲惨的故事制造出鼓舞人心的喜剧气氛。

在浩如烟海的世界小说中搜罗中国小说的典型人物形象,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实:这些人物大多有着双重身份: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曹操、诸葛亮,《水浒传》里的宋江,甚至《西游记》中的唐三藏都如此;还有许多历史学家们经过种种考证认为,贾宝玉就是《红楼梦》作者的化身。于是疑问也油然而生:为什么中国小说如此缺乏虚构和想象呢?答案是同样的:凭空虚构的东西只能满足消遣娱乐的欲望,而不能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伦理目的,这是世所不容的。所以,中国小说大多是从历史事实和民间故事中演义而来的。因为只有这些被认为确实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东西才对人们有说服力。所以

六朝时期那些充满奇特怪异想象的神鬼故事,在欧阳修之前也被归入历史传记一类。因为他们把鬼事和人事同等看待。这种实际的、缺乏玄想的小说观在以小说为文化主流的明朝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当人们评论《三国演义》这部有着“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宏篇历史巨剧的主题时,说法有十几种:宣扬正统说、忠义说、反映人民愿望说、歌颂统一说等等。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3]罗冠中将历史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放在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他们大多是人间道德、智慧、勇武的象征,尤其刘备集团更是政治和道德的化身。而这样一个正义的集团最终却是全盘毁灭的悲剧性结局。这种“美的事物的毁灭”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读者产生了难得一见的悲剧美感,麻木的思维开始复苏,与作者一起思索着失败的原因和人生的意义。然而,早已禁锢的思维模式依然盘旋在狭小的空间。作者在找不到合理答案的情况下,只好将一切归于天命,并通过一些细节做着苍白的解释。如,华容道关羽放曹操后,作者借诸葛亮之口解释道:“亮夜观乾象,见操贼未合亡之身,留此人情,教云长作了,亦是美事。解释虽无力,但对于刘备的同情者来说却还是能够接受的。”

《红楼梦》的问世将中国小说史推向颠峰,传统的悲中有喜的悲剧意识第一次受到质疑和反思,并开始试图抛弃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人生无处不在的悲剧现象也第一次被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认识。同时,给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以重重的一击。在这里社会悲剧和道德悲剧无不在为人生悲剧做出注脚和例证。那深深的迷茫、痛苦、悲哀,以致最后的绝望和幻灭扼杀了一对对美好的青年,无数破碎的心从开始被泪水所模糊,到最后欲哭无泪的彻底幻灭和消亡。社会的腐朽、道德体系的瓦解、人生的消亡,难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景象更令人可悲可叹吗?所以,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称其为“悲剧中之悲剧也”^[4]。然而,梦醒后路在何方?作者在洞悉了人生的空幻后便让宝玉抛开尘世的一切遁入佛门。这种因依然迷茫而漂浮于尘世之外的逃避方法又怎不让人深感惋惜和哀怨呢?尽管我们如痴如狂地沉醉于这曲深重哀伤的挽歌所散发的感伤美中。

悲剧作品受到人物、故事情节等的局限,所以它往往限于史诗、戏剧、小说等艺术形式中;但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晶,表现型艺术(音乐、舞蹈、绘画)也会蕴含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倾向。听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人们会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哀;欣赏刘天华

的《二泉映月》,感受到的就是一种淡淡的如水般的哀愁和感伤。舞蹈也一样。从芭蕾舞中那极度外放的动作、绷直延伸到最长的肢体线条中你似乎看到西方世界那种不断寻求拓展和扩张的气势和文化精神。芭蕾中跳跃的动作很多,完成时要运用蹲的控制和整个肢体放松的外在感觉来造成离地向天的趋势,似乎要克服地心的引力,女演员甚至立在脚尖上。而含蓄与内收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人们顺应天道,安居乐业的意识和精神气质。因此中国古典舞蹈的动作讲究内在的感觉和呼吸的控制,有许多“含胸”、“颌首”的内收性动作。其圆、拧、倾的体态和动作划圆的轨迹则体现出周而复始与轮回的中国哲学精神。绘画方面,西方绘画受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影响,绘画以描绘对象为主,讲究造型的准确、真实,包括对质感、光感的要求,可以说它是一种科学的艺术。而传统中国画追求意境,与中国哲学相互发生,追求和谐的美;主张不偏不倚,中和为美,强调含蓄,追求充实之美。中国绘画中的许多概念,如道、气、心、神、韵、虚、风骨等,原本都是哲学概念,所以,传统中国绘画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的艺术。

宗教长久以来承载着人类心灵的皈依,有了它灵魂不再孤独地流浪,肉体的困苦也获得了精神的补偿,生活从此变得平和、安静。然而,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却从不为能否在宗教中找到灵魂寓所而苦恼。因为先圣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教导人们:“未知生,焉知死?”、“乐天知命”^[5]才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径。这种现时的、乐观的、宿命的伦理观念也是精神的温馨家园。一个人的灵魂有了家园就不再去“胡思乱想”,一个民族的精神有了皈依就会避开悲剧。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化的结晶——中国艺术也因此很大程度上缺失了悲剧精神的陶冶。

参考文献:

- [1]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 [2]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3] 罗宗强, 陈洪. 中国古代文学史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4]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M]. 长沙:岳麓书社, 1999.
- [5] 孔子. 论语 (英汉对照) [M]. [英] Arthur Waley 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张佑法)